

时光烙印

那年我的高考

■李冰

今年高考第一天清晨,我开车送女儿到考点。看着她从容的背影消失在晨光里,我的心猛地一颤,仿佛被一根无形的细线牵回了30多年前——1994年,我参加高考那一年。

那时的高考还在7月。7月的河南是个大火炉,空气黏稠得能拧出水来,蝉鸣撕不开厚重的湿热。对于农村孩子而言,高考不仅是一场考试,更是过独木桥,是改变命运的唯一窄门。三年高中,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:考出去。

父母深知帮不上什么忙,竟做了一个近乎残忍的决定——考前半个月,与我彻底断了联系。就像古时父母送子上了战场,从此音讯全无,只在家中静候捷报或噩耗。后来我才懂,那是父母把担忧生生咽进了肚里,把牵挂狠狠掐断,只为让我安安静静发挥出真实的水平。

考前那一天中午,妹妹顶着毒日头送来几个鸡蛋。她问我准备得咋样,我却几乎是把她赶走的:“你甭管,别来打扰我!”关上门的那一刻,我的心“扑通”狂跳。妹妹的到来像一颗石子投进我刻意维持的平静心湖里,险些让伪装的坚强溃堤。

幸运的是,考场碰巧就是我的教室。熟悉的课桌、朝南的窗,甚至黑板上未擦净的粉笔痕都一如往常。那三天,我在考场与各科题目殊死搏斗。笔尖划过试卷的沙沙声、窗外知了的聒噪、风扇徒劳的嗡鸣,交织成我青春里最庄严的乐章。

紧张吗?当然,但我又出奇地平静。三年的淬炼,早已让我学会在重压下呼吸。估分时,我以为能过大专线就不错了,没想到竟超出本科线30多分。

等待放榜的日子,是另一种煎熬。我不敢让自己闲下来,怕脑子不受控制地去回想那些做错的题,于是拼命干活:背着喷雾器打农药,在毒日头下锄草,跟着父亲蹬车做小生意。汗水浸透衣衫,农药味呛



凡人微光

爷爷的算盘

■朱芙妮

阳光斜斜地打进老屋的窗棂,正好落在墙角那个落满灰尘的老物件上。那是一把算盘,静静地躺在那里,像一个打盹的老人。我轻轻吹去灰尘,棕褐色的木框露了出来,上珠两颗,下珠五颗,是那种老式的七珠算盘。珠子大多是灰黑色的,唯有一颗泛着暗红色的光,像是浸染过岁月的颜色。

爷爷只上了三年小学,算不上有文化,但他喜欢看书,总是随身带着书,有些书纸张已经发黄发脆,边角也卷了起来。闲下来的时候,他就坐在门槛上,眯着眼睛看,有时还会摇头晃脑地吟诵。村里人都说,爷爷认得字,有学问。每逢过年,左邻右舍都请他写春联,谁家有个红白喜事,也总请他去主事。他从不推辞,笑呵呵地应下,然后打开书,认真地查对礼仪规矩。

爷爷的算盘打得好,在方圆十里是出了名的。农闲时节,常有人来找他学打算盘,他总是耐心地教。他说,算盘打得快不算本事,还要打得准,心里要有一杆秤。

20世纪60年代末,大队选会计,大家都推选爷爷。那时集体合作社刚刚走上正轨,生产队的账目复杂得很——粮食收成要算,工分要记,分红要算,还要和公社对账。爷爷接下了这个差事,从此,这把算盘便陪他度过了最忙碌的岁月。

每天夜里,昏暗的煤油灯下,爷爷总是伏在桌前,左手翻着账本,右手拨着算盘珠,“噼噼啪啪”的声音,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脆。父亲说,爷爷做会计那些年,大队的账目从没出过差错。有一年年底,爷爷发现差了一毛四分钱对不上账,忙活了一整晚。公社的会计实在熬不住了,就说:“这钱我个人出了,现在结账。”爷爷却说:“钱我可以出,但账一定要算清。”查来查去,最后发现是公社那边少记了一笔账。从此,公社的会计也服气了,说爷爷的账,算得是毫分不差。

有一年秋天,队里分粮食,有人多领了几斤麦子,被爷爷发现了。那人说好话,想糊弄过去,爷爷硬是不答应,说账目是公家的,少一分都不行。后来那人把麦子补上了,爷爷却自己掏钱买了包烟送给他。有人不解,爷爷说:“账是公家的,人情是人情,不能混在一起。”那算盘上的珠子,在爷爷手里拨动,从来都是干干净净、清清白白的。

20世纪70年代,物资紧缺,大队的每一分钱都要精打细算。有几次,上面来人检查工作,想让爷爷在账目上动动手脚,但都被他顶了回去。那些人威胁要撤他的职,爷爷说:“撤就撤。但只要我在一天,这账就得清清白白。”后来,那些人到底没敢动他,因为大家都信他,换了别人,群众不放心。

那把算盘,爷爷用了十几年,珠子都磨得发亮了,特别是那一颗暗红色的珠子,是爷爷打算盘时用得最多的一颗。

70多岁时,爷爷的眼睛不好了,不再做会计了,但谁家要算个什么账,还是会来找他。他戴上老花镜,手指依然灵活,拨起算盘来“噼噼啪啪”,一点不含糊。有人问他怎么算得这么准,他就笑着说:“算盘珠子也是有灵性的,你对它认真,它就不会糊弄你。”

我拿起这把算盘,轻轻一晃,“哗啦啦”的声音,像是时光在流淌。算盘框上刻着几个模糊的字,我仔细辨认,依稀是“诚实做人,清白做事”八个字。这大概就是爷爷留给我们的家训吧。

往事如昨

麦浪深处的果苗

■张永久

又是一年麦收季。大型联合收割机轰鸣着驶过田野,滚滚麦浪转眼归仓,就连残留的秸秆,也被规整成一捆捆耀眼的金黄。待到秸秆拉出麦田,播种机便紧随其后,大豆、玉米、芝麻等秋作物转瞬便种入泥土。夏收夏种,不过是一周的光景。

时代向前,田野里少了追逐嬉戏的身影。别说城里的孩子,就连土生土长的农村娃,也很少再踏入麦田。我小时候经历的那种麦收时节的热闹与喧嚣,早已在岁月的更迭中渐渐淡去。

我是70后,半生光景,亲眼见证了麦收方式的沧桑巨变。儿时的麦收,全靠一把镰刀。躬身劳作,烈日下挥汗如雨,是夏日最深刻的印记。那时候,一场麦收最少要耗时半个月,若遇上阴雨连绵,甚至会拖拉一两个月。直到我上了高中,小型收割机才慢慢走进田间。而如今,大型联合收割机驰骋沃野,农耕劳作早已褪去往日的艰辛与沉重。

然而,记忆里的麦收,并不全是日晒劳作的苦。一家人手握镰刀,并肩俯在麦田里,说说笑笑间,疲惫便悄然消解。最让人惊喜的,莫过于在满目金黄的麦丛中,撞见一株破土而出的野生桃苗或杏苗,我们似发现了新大陆,满心雀跃。

父母任由我们停下手中的活计,围拢到果苗旁。我和弟弟小心翼翼地浇上自己喝的水,将嫩生生的果苗连根带土挖出,再摘下头上的草帽将它轻

轻罩住。这个时候,父母便会安排我们去装车,把割下来的麦子拉往打麦场,顺便将那株珍贵的果苗带回家。

我们拉着车,带着果苗兴致勃勃往打麦场赶。到了打麦场,顾不上卸车,一路小跑回家,挖坑、栽苗、浇水,忙得不亦乐乎。

往后的日子里,我和弟弟几乎天天都要跑去查看果苗的长势,盼望着它活下来,长成一株大树,枝头挂满甜美的果子。

年年麦收,我们总会带回家一两株果苗,可幼苗娇嫩,能够挺过酷暑、熬过寒冬的寥寥无几。在所有移栽的小苗里,唯有一株杏树顽强地扎了根。看着它抽枝、展叶、开花,待到枝头缀满黄澄澄的杏子,满心都是难以言喻的喜悦。

如今再走进麦田,我依旧会下意识四处张望,期盼能再偶遇一株野生果苗。可身边的孩子,早已对麦田陌生,更不会愿意俯下身,在燥热的天气中费力刨起一株小小的树苗。

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童年,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。时代向前,生活方式悄然改变,这本无可厚非,但我总觉得,孩子们不该不识麦苗、不辨果木,更不该远离土地,错失感知劳动之美、自然之趣的机会。那些扎根在麦田里的童年欢喜,那些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质朴美好,应当被好好保留。